

有关大邑商宫城的几个问题

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殷墟，大邑商，宫城，边界

摘要：商代晚期都城大邑商的宫城范围与布局一直是商代考古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宫殿区西面所谓的“大灰沟”形态断续、填土特征异常，实为取土坑而非宫城防御壕沟；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与M54墓葬等遗存，应系宫城以南、干道东侧的殷商王子贵族族邑；殷都路（小屯南路）东西一线的商代道路可能是宫城南界；宫城西北部的巨型沙土坑为洹河古河道。综上，本文提出宫城原有西、南边界的看法应重新审视，其范围可能较以往认识有所收缩，后续需要系统性勘探，结合道路网络、水系变迁等多重线索复原宫城空间结构。

KEYWORDS: Yinxu, *Dayi Shang* (Great Settlement of Shang), Palace precinct, Boundary

ABSTRACT: The extent and layout of the palace precinct of *Dayi Shang*, the late Shang capital at Yinxu, have long been a central issue in Shang archaeolog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o-called ‘Great Ash Ditch’ to the west of the palace area, characterized by its discontinuous form and anomalous fill,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borrow pit rather than a defensive moat. Features such as the oracle bone pit no. H3 at Huayuanzhuang East and the large tomb no. M54 are likely associated with a princely or aristocratic lineage settlement situated south of the palace precinct and east of a major thoroughfare. The Shang-period road along present-day Yindu Road may have marked the southern boundary of the palace precinct, while the large sandy deposit in the northwest is identified as a paleochannel of the Huan River.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these observations call for a reassessment of the previously proposed western and southern boundaries of the palace precinct, suggesting that its extent may have been more restricted than previously assumed. Further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tegrating evidence from road networks and fluvial landscape change, will be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palace precinct.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大邑商遗址，厘清大邑商的规模、布局以及功能区划一直是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其中宫城（或称为宫殿宗庙区）作为商王朝晚期政治与礼仪活动核心，其范围、规模与布局，自1928年殷墟考古启动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但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梳理有关学术史，考察近百年殷墟考古历程和研究成果，鉴往知来，助益今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本文主要对有关小屯宫殿区西侧和南侧的所谓“大灰沟”、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以及巨型沙土坑有关发现和研究进行梳理，就宫城的范围等几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一、殷墟近百年考古与布局探索

回顾近百年的殷墟考古史^[1]，厘清大邑商城市规划和布局是时代赋予殷墟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近百年的探索历程充满艰辛，也取得了辉煌成果。

1908年，罗振玉确认甲骨文出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指出小屯一带为殷墟所在^[2]。1928~1937年间史语所考古组主持的殷墟早期十五次考古发掘^[3]，对明晰殷墟的布局有开创性贡献。1928年第一次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需要厘清殷墟的范围，通过“洹河畔之寻访，务使殷墟之范围及其蕴

藏皆于此举窥得其真象(相)也”^[4]。结合调查和发掘信息可知,“自河畔直达村中一里之内皆殷墟遗物所在之地也”^[5]。工作地点首选小屯村,这抓住了解决王宫区及大邑商规模与布局研究的重点。所以说,确认商王都宫城以及殷墟范围的目标和任务发轫于第一次殷墟考古。1928~1937年的前五次发掘中,在小屯开展工作十二次,这是最多的。

1931年安阳第四次考古发掘选点在小屯村西边的四盘磨、小屯村东南的后冈^[6],起因是在1929年的第三次发掘中考古人员认识到“殷墟的范围是超过小屯村境界以外的”^[7],尤其考虑到后冈隆然高出四周的地势和遍布的绳纹陶片,还有四盘磨以出土铜器墓葬出名且1929年秋有人在该地盗挖墓葬等情形,明确“要了解小屯,必须兼探四境”,“想用由外求内的方法,发掘小屯四境,以解决小屯”,发掘所见小屯殷商一类遗存的范围不限于小屯一地。按照1931年的考古计划,为了探求殷墟的范围,考古组将工作范围向外扩大,即在洹河两岸十里以内寻找与殷墟同时的文化遗物及遗址,以殷墟的遗物为标准,进行比较研究^[8]。

从殷墟前五次考古工作来看,发掘范围以小屯为中心逐渐扩展到洹河南北两岸^[9]。工作地点除了工作次数最多的小屯,还有后冈、四盘磨、王裕口与霍家小庄、高井台子、侯家庄南地,武官南坝台、四面碑、大司空、侯家庄西北冈、同乐寨、范家庄等12处。其中除了范家庄认识不清外,其他12个遗址所占的范围,西起同乐寨,东至后冈,中间相距约五千米,各自距离洹河最多不过一千米。距河较远的地方,经仔细调查发现一、二处遗存,但不如洹河上的遗址密集^[10]。自1931年起至1937年止,考古组每年夏冬两季开展调查,在洹河流域共发现60多处遗址^[11],多数都在后来明确的殷墟范围内。这些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土了以YH127坑为主的晚商刻辞甲骨^[12]和以甲、乙、丙组为代表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13],从而确认了商

王的宫殿区所在;在侯家庄的西北冈发现了商王陵区^[14],据这些殷墟考古史上的重大成果获知殷墟这个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中心以及宫城与商王陵区两个最重要功能区的建置方位。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断十年的殷墟考古工作迅速恢复。1950年春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武官北地的商王陵东区和四盘磨进行了发掘^[15]。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规划布局工业基地、建设安阳现代城市的新形势下,殷墟考古项目明显增多,50年代后期提出了探索殷墟范围与布局的课题^[16]。1958年春至1961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为配合安阳市的基本建设工程,在小屯西地、苗圃北地、高楼庄后冈、张家坟、白家坟、王裕口西地、梅园庄、孝民屯、北辛庄、范家庄、后冈、大司空东南地和武官北地等13个村庄(地点)进行了发掘,除小屯、后冈、大司空、武官北地(商王陵东区)外,其他都为新的工作地点^[17]。重要的发现如苗圃北地、孝民屯西地有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在大司空村东南地和北辛庄有制骨作坊;白家坟西地有平民的墓葬区;小屯西地、大司空村第三区等处则为居住区;在小屯村西地发现了一条大灰沟^[18],有些学者推测大灰沟可能是保卫宫殿宗庙的防御措施。这些新发现扩大了对殷墟范围的认知,学界认为基本上探明了殷墟的范围,也得到了研究殷墟布局的一些重要线索^[19]。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殷墟地下埋藏信息,估计殷墟的面积约在24平方千米以上^[20],这些地点处于东西长约6千米、南北长约4千米的范围内^[21],此范围之内居址和墓葬比较密集。在此基础上,1961年殷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出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外围区。此后除1967~1968年外,殷墟考古工作每年持续不断,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安阳城市建设全面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分别在划定的殷墟保护区内、外区域进行了多次

钻探与发掘，新发现了20多处遗址和墓地，殷墟的范围又有扩大。由此推断殷墟的范围为东西长约6千米、南北宽约5千米，总计达30平方千米^[22]。以殷墟文化的分期为基础来观察，殷墟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在第一期偏晚阶段（约相当武丁早期）时范围东西长约3、南北长约4千米，面积约12平方千米；到殷墟文化第三、四期（相当廩辛、康丁至帝乙、帝辛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王都的范围扩大到30平方千米^[23]。东边约以京广铁路为界，铁路东侧有些村落中也有殷商文化遗迹，如郭家湾；北边在三家庄、小营北到秋口一线；西边以安阳钢铁公司西侧为界（约在安阳发电厂东墙南北延伸线上）；南边大致以万金渠为界。这个范围以外，个别村落内也零星发现有殷商文化遗迹^[24]。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阳市文物队在殷墟保护区外围进行钻探并配合基建开展考古发掘，发现殷墟文化遗址的范围与原划定的殷墟保护区相比范围有较大扩展，特别是殷墟南界向外扩展较多，其中东界在太平庄西向南经北小庄村东（高楼庄村东）至和平路一线，南边在梯家口村西至东八里庄一线，西界从戚家庄村东向西北、经安钢西墙北至范家庄村西北的连环寨、同乐寨一线，北边从秋口村经小营村东到三家庄村、董王度村一线，由此可知殷墟的范围东西约6.5、南北约5.5千米，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25]。这样，殷墟的面积有30或36平方千米被研究者经常提及。但据最新考古发掘地点测算，殷墟的面积约29平方千米，再考虑一些可能未发现的区域，殷墟面积约30平方千米应是比较妥当的。

回顾这个历程，殷墟考古经历了从起初的为保护殷墟甲骨文物不被私掘滥盗，到探寻大邑商都城布局，再到构建包括商代在内的中国上古史、实证中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早到3000年前的商代三个阶段。其中涉及大邑商布局探索方面的成果很多，举其大者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集殷墟考古60多年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为一体，对大邑商布局

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梳理和概括，把各类重要考古现象（居址、铸铜和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区以及墓葬区）标绘成图^[26]，从中可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对大邑商的范围、功能区划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1999年发现的洹北商城^[27]是探索大邑商布局的重大成果之一；2004~2005年对小屯宫庙区甲、乙、丙、丁四组建筑基址及其周围区域的大范围勘探后，发现近百座夯土建筑基址和超过5万平方米的巨型沙土坑（或称池苑遗址），对宫城的规模和布局有了新的认识^[28]；对洹北商城与殷墟路网与水网的综合研究反映了新世纪殷墟考古研究的新视角和研究模式的转变^[29]；2021~2025年在殷墟洹河北岸地区发现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和西北冈商王陵区的围沟等是大邑商布局探索的新突破^[30]。

二、大邑商宫城考古的进展与争议

随着对大邑商城市布局和功能区划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有关其王宫范围、内部格局的问题尤为学界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开展工作地点的增多、研究关注点的细化，以小屯为中心的商王宫城（宫殿宗庙区）的规模、布局开始引起更多讨论。据统计，迄今为止以探索大邑商布局为目的的考古发掘地点超过60处，其中与宫城相关的考古工作，在小屯村一带的发掘有40次之多^[31]，这也是殷墟考古工作最多的地方。重要的发现有很多，如小屯东北地的大型建筑群、甲骨坑、小屯西地的大灰沟、小屯北地的巨型沙土坑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现象。

20世纪30年代，考古人员在小屯北地发掘53座建筑基址，占地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石璋如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32]，并认为甲组基址可能是居室，乙组基址可能是宗庙所在，丙组基址可能是祭祀的场所^[33]，认为这里是商王的宫殿宗庙，此说影响很大，为研究者普遍认可和引用，将这几组建筑群所在的区域称为宫殿宗庙区。20世纪50年代开始称其为小屯东北

地,经过实测,该区域东西宽约450、南北长约600米,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34]。1976年妇好墓发现后,结合1949年之前妇好墓以东发现有三座较大的墓,其中一座被盗掘出器物数量极多,因此学者们认为大概在殷代早期,宫殿宗庙的范围并不太大,某些王室成员就埋葬在建筑群附近不远的地方^[35]。1981年,在乙二十东南近80米处发现平面呈“凹”字形的建筑群,1989~1991年经正式发掘,编序为丁组^[36]。丁组建筑群的发现,扩大了以往所知的宫殿区建筑群范围。1973年9月,小屯村北约700米处发现龙纹大石磬1件,随后考古人员对该地点进行了发掘,但没有重要发现。该地点东距甲组基址约250米,陈志达据此认为,甲组基址的西面界限大体不会超过该地段^[37]。他还注意到,宫殿宗庙的西面和南面还有大片空白地段,之后应进行全面勘探,选择重点区域进行发掘。只有继续深入田野工作,才能探明宫殿宗庙遗址的范围与布局^[38]。

研究者普遍认为,小屯村西地“大灰沟”的发现,大大扩展了宫殿宗庙区范围。1958年秋,为配合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建设,在小屯村西地考古工地探方内发掘出一段南北长20米的大沟,或称“大灰沟”(图一)。此沟开口的文化层被一座殷墟二期的墓葬打破,故断定其可能开挖于殷墟二期或更早。1959年,沿灰沟南、北两端进行钻探,发现该沟由西南向东北蜿蜒,总长约820米(直线),沟中多段填有灰土。其中在发掘区以北的一段沟内填土又分为三种,偏北一段南北长608米,填淤土,北端直达洹河南岸,由于淤土的范围很大,所以没有找出它的东边;中段长140米,填灰褐土;南段长218米,填灰土。钻探可见大灰沟的南端延伸到花园庄村稍北处,往南未再钻探。通过这些工作,当时推测这条灰沟可能是统治阶级用来护卫殷王宫的一条防御性壕沟。但由于向南延伸的花园庄村以南地段尚未开展工作,因此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工作确认^[39]。1971年冬在小屯村西地又一次发掘到大灰沟,所见宽度约24米,

深约数米^[40]。1986年,为配合花园庄村民建房,在村西地、南地大面积钻探找到了1958年发现的小屯村西地大灰沟向南延伸的部分,在村西南转向东通连洹河^[41]。同时在沟的转弯处内侧发现巨型坑,其中填有大量废骨料。此坑表面有路土,其上有14条车辙,多数为东西走向。至此可明确大灰沟南北长约为1100、东西长约650米,其围起的面积超过71万平方米。大灰沟的发现改变了之前对宫殿宗庙区(宫城)范围的认知,重新划定后其规模增大了不止一倍。大灰沟恰好环绕在宫殿宗庙区的西、南两面,与北端、东端两面的洹河相接,推测它可能是宫殿宗庙区外围的防御性壕沟^[42],此沟西段可能是宫殿宗庙区的西界^[43],是王宫周围的防御设施,它代替了城垣^[44],并把商王及王室成员的居住地与其他地区分开^[45]。宫殿宗庙区所在的小屯村东北地地势高、水源近,有利于生产生活,又可避水患,围绕在宫殿宗庙建筑群西、南两面的大沟,犹如晚期的“宫城”,值得重视^[46]。殷墟大邑商都城布局是由一些族邑围绕王族邑组成,其中小屯宫庙区是王的族邑,亦即宫城^[47]。

自大灰沟发现后,很长时期内把大灰沟视为宫城边界成为学界主流认识,该边界内的考古发现自然被看作王宫范围内的遗存,如1986年在花园庄西南地发现的以巨型坑为代表的商代晚期遗存、在花园庄东地以1991年发掘的H3^[48]和1991~2001年发掘的以M54为代表的商代晚期墓葬^[49](图一)等。但此后有学者对大灰沟为宫城边界持否定态度^[50]。

综上,殷墟考古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工作区域的扩展、研究的细化,对以小屯为中心的商王宫城(宫殿宗庙区)的规模、布局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有分歧。迄今关于宫城布局的研究还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如主要从事殷墟考古的研究者对大灰沟是否为宫城边界存在明显分歧。实际上,对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与宫城范围与布局的关系、巨型沙土坑(图一)的性质等还有必要继

应是一处坑状堆积^[56]。这样，学界对这个所谓的“大灰沟”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分歧。

笔者综合多方因素判断所谓的“大灰沟”不是沟。第一，沟作为一种遗迹具有一定的形状、特点和功能。殷墟也发现过不少沟类遗迹，宽、窄都有。最宽的如在洹河以南的多个地点发现的干渠和支渠^[57]，从安钢厂区向东偏南方向延伸到中州路东侧，总长超过3.1千米。又分干渠、支渠两种，干渠在西北方向，支渠在干渠东南，与干渠相接。干渠、支渠截面都呈倒梯形，干渠的口一般宽3~6米，个别地段超过10米，支渠宽度与其接近，有的地段略窄，深2.7~4.4米。这类沟的功能应该是引水渠。第二，据1958~1959年发掘和钻探所见，大灰沟窄处约7米，最宽处达21米；沟的深浅也不一，最浅处约3米，最深处约10米^[58]。1971年冬在小屯村西地又一次发掘到大沟，所见宽度约24米多，深约数米^[59]。此外还有一些沟一般宽约10米，最宽处为20米以上，深约5米^[60]。与殷墟发现的形制规整且明确用于引水、排水的商代沟渠相比，大灰沟在深度上变化极大（最浅3米、最深逾10米），且局部呈深坑状，不具备人工水渠或防御壕沟的连贯性与功能，且其内部填土自西向东倾斜更暗示其为倾倒垃圾的取土坑。第三，所谓花园庄南的大灰沟的东西向一段，迄今也未发现。第四，以前对所谓的“大灰沟”是宫殿宗庙区（宫城）外的壕沟、边界的定性，实际上缺乏有力证据。如小屯西地的大沟剖面（第一区T104~T106南壁剖面图），沟内填土自西向东倾斜，可见是从沟西向东倾倒^[61]，而且局部很深且不规则，实际就是一些深坑。将大灰沟看作是环绕宫城的壕沟的话，沟内填土则为向宫城方向倾倒的垃圾，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作为最高统治者商王的宫城不可能以倾倒垃圾、污水横流的一些大坑为西界，应该在這些大坑以东的地方。以夏王都二里头的宫城为参照基准，即以明确的宫城墙以及墙外道路作为界标，如果所谓的“大灰沟”是殷商王都宫城的西界，在沟外铺设道路甚

至干道的概率是很高的，但实际并没有发现。因此，这个所谓的“大灰沟”自然不是宫城边界，且对确定宫城范围也没有意义。

再来看花园庄东地以H3甲骨坑、M54为代表的遗存，这些发现关系到宫城南界的确定。1991年秋，在花园庄村东南、今广场南路东头的殷墟路东侧发现一座甲骨坑，编号为91花东H3。坑内共出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辞的甲骨689片，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晚段，具体为武丁早期^[62]，这是殷墟考古史上第三次甲骨大发现。学界公认花东H3刻辞甲骨为非王卜辞，问疑者为“子”。1992年4月至2002年3月，工作人员在花园庄村东陆续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房基1座、灰坑13个、殷商墓葬42座，其中M54位于H3西北50米处^[63]（图一）。M54开口长约5.04、宽约3.3米，墓深近6.3米。此墓共出土各类随葬品577件（还有铜镞881件、铜泡149件未计入总数），包括青铜、玉、石、骨、陶、象牙、竹类器等。青铜器265件，包括容器40件，其中分别有5套1组和4套1组的觚与爵组合。131件青铜器上有铭文，除1件戈（M54:126）、1件分档鼎（M54:167）外，其他青铜器铭文为“长”“亚长”，证明墓主为亚长。亚为职官名，长为氏名。包括H3甲骨坑、M54在内的这些遗迹相距不远，又在通往小屯东北部大型建筑区的干道东面，这些发现对于确定商王宫城南界有重要价值。

如果明确花园庄东地H3甲骨卜辞问疑者“子”的身份及其与M54的墓主的关系，结合2002年小屯南路西段（今殷都路）发现的商代晚期干道的东西向道路，可以判断H3与M54所在的一带并不在大邑商王宫内。

大多数学者认为包括花园庄东地H3甲骨卜辞在内的殷墟非王卜辞的问疑者为“子”。林沄认为“子”是男性贵族的尊称，为奴隶主贵族族长^[64]。朱凤瀚认为殷墟卜辞的“子族”是王子之族，“多子族”是多位王子之族的集合^[65]。李学勤在《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子”》一文中指出甲骨金文的“子”比爵称的“子”

内涵要更广泛一些，其中花园庄东地H3卜辞的“子”、子组卜辞的“子”，由于出现在大邑商都城范围内，推定其为朝中大臣应当是合宜的；金文的“子”则当有诸侯在内”^[66]。与花东问疑者身份相似的“子”在传世殷墟卜辞里也有记载。董作宾在《五等爵在殷商》里指出，卜辞中有称“卜”或“子卜贞”者凡三十余见，字画皆甚纤细，似出一人手笔。子兼卜与贞，与他辞“王卜贞”同，既能自卜，且主贞事，与史官之作贞人者不同，此子乃王子某，但称子不自署名而已。在卜辞中，子对王而言，当然就是王子了^[67]。

商人王子的居地，有在商王宫区内者，也有在王宫以外的。前者如子渔，见于殷墟甲骨卜辞，为商王武丁之子，有研究认为是嫡子^[68]，有继承王位的权力，他的墓葬（1977AXTM18）发现于小屯宫殿区^[69]，肯定生活在王宫内；1936年发掘的小屯YH127^[70]甲骨卜辞中，其中除有王卜辞外，还有非王卜辞，其中问疑者“子”与商王关系当甚为亲密，李学勤认为其为商王亲属或近臣^[71]，可能也生活在王宫内。后者如侯家庄南地的大龟七版^[72]卜辞中的“子”，居地在西北冈商王陵区南近千米、洹河北岸处，王宫外，其显然与王宫中王子的地位有差异，不可能是时王的近亲。

花园庄东地H3问疑者“子”是否生活在王宫内呢？主流意见认为他身份高、甲骨坑H3一带又在大灰沟南段内，自然居于王宫之中。但这种说法还有讨论的余地。前文提到所谓的“大灰沟”南段并没有发现，所以这里并不是王宫的南边界。还有一点，2008年在刘家庄北地发掘确认有商代晚期南北向干道经此向北通向小屯宫殿区^[73]。如果H3所在区域位于宫城之内，则其恰好处于宫城南向中轴线东面的核心地带。纵观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此类宫前核心区域有独立家族聚居地的概率极低（类比明清紫禁城午门内不可能设私家宅邸）。将其定位为宫城外、建于南北向干道东面的贵族族邑更为合理。关于这一点，还可进一步补充讨论。

花东H3卜辞中子的身份，先前有武丁从兄弟说，这是基于花东H3卜辞时代为武丁早期^[74]立说。现在，学界多倾向于武丁晚期说^[75]，加上对卜辞中有关人物关系的梳理^[76]以及从疾病卜辞、人物之生死、占卜事项、甲桥刻辞、卜甲整治五个方面的补充论证^[77]，研究者普遍认为可他是武丁的子辈。由于花东卜辞中，子所祭祀商之先王除上甲、大乙、大甲外，频繁所祭之近祖以祖甲、祖乙、妣庚为序，且对妣庚的祭祀最隆重。有研究者据此推断祖甲、祖乙分别是商王武丁的父辈阳甲、小乙，妣庚为小乙之配，因此提出“子”为商王武丁亲子说^[78]。但子所祭的近祖即商王武丁的父辈以非直系的祖甲（阳甲）为先，之后是武丁之父、直系先王小乙，却总是漏了阳甲与小乙之间非直系的盘庚，可见在近祖中阳甲是绕不开的，这种祭祀序列或暗示子不一定是商王武丁之子，有可能为阳甲之后。当然本文只是提出猜想，并没有证据。还有研究认为花东卜辞的子是武丁的嫡子孝己^[79]，但孝己早死，所处时代不可能到武丁晚期，也与花东卜辞的时代矛盾；而且孝己作为武丁的嫡子，应该生活于王宫内、今小屯东北地的大型建筑群区，像妇好、子渔那样埋葬在王宫内核心区。

前述H3甲骨坑与M54等相距不远，这些重要的遗迹分布于相对狭小的区域，他们分属于不同家族的概率极低，更有可能属于同一家族。既然H3甲骨卜问者“子”的身份是王子，后一个墓主为长氏，则他们同属于长氏。长氏，或即长子之后，正如河南鹿邑长子口西周初年大墓^[80]所出青铜器自铭“长子口”，以长子为氏，墓主明确是商王之后。依此例，花东卜辞的子非商王的嫡子，而是长子，由于没有继承王权的权力，居于商王宫之外是顺理成章的。

综上所述，大邑商商王宫的南界不会是原标定的“大灰沟”南段位置，而应该在其以北处。对比二里头宫城外有道路^[81]的情况，大邑商王宫以2002年小屯南路（今殷都路）发现的東西向干道一线为南界的概率最高。

最后讨论小屯宫殿区西面巨型沙土坑（或称人工池苑），它是解析宫城西部格局不可或缺的一环。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人员已发现小屯北地宫殿建筑区的水沟K14向西通向大黄土沟^[82]。后来陈志达注意到，宫殿区的西面和南面还有大片空白地段，应进行全面勘探，选择重点进行发掘。他指出只有继续深入田野工作，才能进一步弄清这一遗址的范围与布局^[83]。其中西面的空白地带实际是沙土坑区。2004年秋至2005年秋，为配合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安阳工作队对小屯宫庙区甲、乙、丙、丁四组建筑基址及其周围区域进行了系统勘探，在小屯宫殿区建筑基址群西面发现一个巨型沙土坑（即沙土坑），深约12米，面积不少于4.5万平方米，它被战国墓打破，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安阳工作队判断它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池苑遗址^[84]。2019年春至2020年秋，安阳工作队继续勘探并进行主动发掘，以便探明池苑遗址的规模、分布范围、堆积状况、使用年代和废弃过程。勘探确认池苑遗址规模达5万余平方米^[85]，深度远超晚商时期宫庙区9米深的地下水位线^[86]。笔者据地图测算，其实际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巨型沙土坑的发现，丰富了大邑商宫殿区的内涵，有关研究也更新了对宫城范围及布局的认知^[87]。

小屯宫殿区西面的巨型沙土坑有两个特点，一是面积巨大，超过10万平方米；一是很深，最深处超过12米，低于商代晚期的地下水位。规模如此大的深坑在机械化发达的今天也要首先降低地下水位才能开挖，在商代更非人力所能挖成。钻探所见，该坑沉积物从表土以下到12米深以河流相洪积形成的细沙土为主，越到下部沙的成分越重，深度远超商代地下水位，在商代人工开挖的可能性极低。更重要的是，其走向与2021年以来在洹河北岸新发现的洹河古河道自然衔接。

2021年以来，在殷墟洹河北岸地区发现三段洹河古河道^[88]，有两段在商代为洹河河道，其中武官西南地的南坝台一段的古河道先向北

拐、再通向东南方向，向下到武官东南地又通向东北方，这一段为商代的洹河河道北岸，在今天安阳河北岸以北200米一带，再向下接巨型沙土坑的西北口段。考虑到河水流动造成河道摆动的因素，这几段的走向正好在洹河水动力的冲击摆动线上，这决非偶然。综合以上分析，从地质学和考古发掘来看，将巨型沙土坑定性为一段商代存在的洹河河道，较之“人工池苑”更为可靠。

四、结语

上文通过三个方面，就涉及大邑商宫城范围与边界的有关发现和遗存做了讨论。本文认为，所谓“大灰沟”并非宫城边界，宫城西界应在其以东，需结合外围干道级别的道路走向及建筑基址群重新划定；宫城南界可能在花园庄北地、今殷都路（小屯南路）一线；宫城西北部的巨型沙土坑应该为古河道。后续的研究应加强系统性勘探与多学科整合，结合道路网络、水系变迁等多重线索等复原宫城空间结构。

[1] a. 石璋如. 考古年表[M]. 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2. b. 胡厚宣. 殷墟发掘[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c. 李济. 安阳[C]// 李济文集(第2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51-386. d.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e. 杨锡璋. 殷墟发掘大事年表[C]//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478-482. f. 陈志达. 殷墟[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482. g. 岳洪彬. 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大事记(1928-2008年)[C]// 殷墟与商文化: 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641-654. h. 石璋如编撰, 李匡悌, 冯忠美辑补. 安阳发掘简史[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9.

[2] 罗振玉. 殷商贞卜文字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3] a. 同[1]a. b. 同[1]b. c. 同[1]c. d. 同[1]h.

[4] 董作宾. 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C]// 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 北平: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9: 7.

[5] 同[4]: 33.

[6] 李济. 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C]// 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 北平: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 所, 1933:568.
- [7] 李济. 十八年秋工作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C]// 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 北平: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0:226.
- [8] 董作宾. 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C]// 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91.
- [9] 石璋如. 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J]. 中国考古学报, 1947(2):77.
- [10] 同[9]:73.
- [11] 同[1]a:99.
- [12] a. 石璋如. 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C]// 六同别录(上). 北平: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5. b. 同[9]. c. 胡厚宣. 殷墟发掘[M]. 重庆: 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98-101. d. 石璋如. 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丁编·甲骨坑层之二——十三次至十五次出土甲骨(上)[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2:71-145. e. 同[1]h:125-130.
- [13] 石璋如. 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9.
- [14] a. 同[12]c:71. b. 同[1]h. c.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d.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5. e.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7. f.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g.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8. h.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6. i.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4.
- [15] 郭宝钧. 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J]. 中国考古学报, 1951(5).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280.
- [17] 同[16]:2.
- [18] 同[16]:94-96.
-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1958—1959年安阳殷墟发掘简报[J]. 考古, 1961(2):65.
- [20] 同[19].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40.
- [22] a. 郑振香. 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J]. 考古, 1988(10). b. 同[21]:25.
- [23] 同[21]b:41-42.
- [24] 杨锡璋, 刘一曼. 殷墟考古七十年的主要收获[C]// 考古学集刊·纪念殷墟发掘七十周年论文集(第15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19.
- [25] 孟宪武. 安阳殷墟边缘区考古概述[C]// 安阳殷墟考古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10.
- [26] 同[21]b:41. 图一四.
- [27] 唐际根, 刘忠伏. 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 为完善商代考古学文化框架提供关键性资料, 专家确认为商代考古重大突破[N]. 中国文物报, 2000-2-20(1).
- [28]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J]. 考古学报, 2009(2). b. 岳洪彬, 岳占伟, 何毓灵. 小屯宫殿区布局初探[C]// 三代考古(第2辑), 2006:335. c. 岳洪彬, 等. 近二十年来殷墟小屯宫殿区考古发掘与布局研究的新认识[J]. 中原文物, 2023(5).
- [29] 唐际根, 等. 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水网[J]. 考古学报, 2016(3).
- [30] a. 牛世山. 2021年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考古勘探取得重要成果——新发现围沟和祭祀坑等重要遗迹[N]. 中国文物报, 2022-5-13(6).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J]. 考古, 2023(7). c. 牛世山. 殷墟(大邑商)都城规划与布局研究的回顾与新进展——2021-2022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区的考古新收获[C]// 三代考古(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d. 牛世山, 李潇檬, 郝莹莹.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C]//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4).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5. 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考古勘探收获述要[C]// 三代考古(十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
- [31] 资料来源见以下文献: a. 同[1]a. b. 同[1]e. c. 同[1]g. 按1928—1937年前15次的统计发掘次数惯例, 跨年的算两次.
- [32] 同[13]:20-25.
- [33] 同[13]:332.
- [34] 同[21]:52.
-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233.
-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小屯建筑遗存[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10-13.
- [37] 陈志达. 安阳小屯殷代宫殿宗庙遗址探讨[C]// 文物资料丛刊(10).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77.
- [38] 同[21]:69.
- [39] 同[16]:96.
- [40] a. 郭沫若. 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J]. 考古, 1972(2). b. 同[21]:52.
-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92(1).
- [42] 同[16]:91.
- [43] 同[37]:77.
- [44] a. 同[22]a. b. 同[21]:23-24.
- [45] 同[24]:21.
- [46] 同[22]a.
- [47] 郑若葵. 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J]. 中原文物, 1995(3):87.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49] 同[48].
- [50] 唐际根, 荆志淳. 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J]. 考古, 2009(9).

- [51] 岳洪彬,何毓灵. 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N]. 中国文物报, 2004-10-15(7).
- [52] 岳洪彬,岳占伟,何毓灵. 小屯宫殿区布局初探[C]//三代考古(二).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335.
- [53] 同[52].
-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J]. 考古学报, 2009(2).
- [55] 谷飞. 关于殷墟宫庙区问题的几点思考[C]//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 [56] 同[50].
- [57] a. 同[29].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J]. 考古, 2012(12).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J]. 考古, 2009(7). d.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新安庄西地2007年商代遗存发掘简报[J]. 考古, 2016(2).
- [58] 同[16]:94.
- [59] a. 郭沫若. 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J]. 考古, 1972(2). b. 同[21]:52.
- [60] 同[21]:94.
- [61] 同[16]:91.
- [62] 同[48]:35.
-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 [64] 林沅. 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C]//古文字研究(第1辑).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79:323.
- [65] 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增订本)[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39-56.
- [66] 李学勤. 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子”[C]//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125.
- [67] 董作宾. 五等爵在殷商[C]//董作宾学术论著(下册). 台北:世界书局, 1962:421-422.
- [68] 董作宾.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C]//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 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3:381.
-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J]. 考古学报, 1981(4).
- [70] 同[12]:d.
- [71] 李学勤. 花园庄东地卜辞的“子”[C]//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125.
- [72] 董作宾. 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C]//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 [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J]. 考古, 2009(7).
- [74]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35, 前言. b. 朱凤瀚. 读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出土的非王卜辞[C]//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211.
- [75] a. 陈剑. 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附:释“速”[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4(4). b. 姚萱.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M]. 北京:线装书局, 2006:51.
- [76] 赵鹏. 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M]. 北京:线装书局, 2007:304.
- [77] 黄天树. 简论“花东子类”卜辞的时代[C]//古文字研究(26).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 [78] 姚萱.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M]. 北京:线装书局, 2006:51.
- [79] 杨升南. 殷墟花东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C]//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8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J]. 考古, 2004(11).
- [82] 同[13]:237.
- [83] 同[21]:69.
- [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J]. 考古学报, 2009(2).
- [85] 岳洪彬,等. 近二十年来殷墟小屯宫庙区考古发掘与布局研究的新认识[J]. 中原文物, 2023(5).
- [86] 同[85].
- [87] 杜金鹏. 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34-39.
- [8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考古勘探收获述要[C]//三代考古(十一).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6.

(责任编辑 牛海茹)